

第六章

宋子文献媚法国

宋子文致函戴高乐

自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法国大使贝志高，向戴高乐暗送秋波之后，法国即派威廉·乔治·皮科^①来渝访问。宋子文作为外交部长，当然不甘落后，紧步蒋介石的后尘，作出十分友好的姿态，热情接待了法国代表皮科。并乘他访渝返法之便，于1944年12月15日，以外交部长名义给戴高乐写信一封，交皮科面呈，向法国献媚。信中表示要恢复中法两国在战前建立的真诚友谊，圆满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意旨心领神会，给戴高乐的信也写得情深意切。兹摘抄如下：

“本人一向是法国的朋友。兹乘乔治·皮科先生返回巴黎之便，谨向阁下为自己祖国作出的一切功绩深致敬意。

“此次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们两国不承担其所应负的维护持久和平的责任，持久和平将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即为了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中国和法国今后必须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间在战前建立的真诚友谊。

“本人已向贵国大使保证，我们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我确信您必然也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我认为根据这些条件，我们之间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圆满解决的。

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②

戴高乐收到宋子文的信后，自然是“十分感动”，认为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因而于1945年2月17日即给宋子文复信说：

“您在12月15日的来信中所说的话，使我十分感动。我非常重视您对法国的友谊。

“我和您一样认为，战后中国和法国必须联合努力，以便为维护持久和平作出贡献。

“法国代表在贵国所受到的欢迎使我确信：为了我们两国的非常密切的传统友谊和最大利益，我们已把法中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特别重视您向法国大使保证的关于处理中法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诚意。在我们方面，您也会看到同样的诚意。

“顺此谨向阁下表示我对中国即将取得的胜利的祝贺，中国的胜利也就是盟国的胜利。请您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③

宋子文赴法会谈

经过宋子文与戴高乐书信往返，双方一拍即合。正如戴高乐所说：“我们已把法中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对当时所谓“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进行讨论”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共同需求了。所以在1945年9月19日，我们作为国民党行政院顾问团成员，刚从重庆出发，尚未抵达河内的时候，宋

子文以行政院院长身分访问巴黎，已经与戴高乐总统谈上了。

据法国总统府秘书处整理的谈话纪要记载，戴高乐于1945年9月19日接见了宋子文。陪同宋子文被接见的有驻巴黎大使钱泰。

会谈开始时，戴高乐对宋子文说，“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来巴黎访问，使他有机会就法国政府在当前情况下认为最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进行讨论，他感到非常高兴。

接着他就提出越南问题，说法属印度支那的形势，特别是东京（即河内）地区的形势，目前显得十分混乱。在这些地区存在着形形色色临时出现的组织，它们都自称为越南政府。这些组织都是由在日本投降前与日本有联系的人和战争结束后（这一点在这一地区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跑到最前列去的共产党人组成。这些组织表现出无能力应付由于当局的疏忽、由于交通组织的破坏、以及在总的情况下由于占领和军事行动所造成的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今天，由于卢汉和中国占领军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情况变得复杂化了。这种态度与法国政府根据宋子文在华盛顿向戴高乐所作的保证，以及蒋介石在重庆向贝志高所作的保证而理解的中国政策是不相符的。

宋子文解释说，他完全同意戴高乐的看法。中国人是言而有信的，向法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将会受到尊重。宋子文还把他在伦敦从报纸上了解到亚历山德利所遇到的一些麻烦报告蒋介石后所获得的复电念了一遍，并向戴高乐重申国民党政府的正式保证：“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宋还说，蒋介石认为，卢汉推迟法国部队进入印度支那，大概是由于卢汉所属部队作战地区的交通受到破坏，发生梗塞所致。他已命令参谋长进行调查，从速具报。

在会谈中，宋子文多次重申这些保证，着重声明中国希望法国仍然是中国在亚洲的邻邦。他认为，他回重庆后就可以看到按法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妥善解决的局面。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他将亲自出马处理这些问题，以便满足法国的愿望。

戴高乐对宋子文的明确声明表示感谢，并问宋子文在国际政治问题方面是否要特别了解一下法国政府的立场。宋子文即说，他希望知道戴高乐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戴高乐答复说，法国政府迁回法国后，鉴于战争还没有结束，法国的领土上还有外国军队，所以认为成立一个容纳法国一切政党都参加的政府是适当的。从那时起，就必须剥夺共产党乘国土解放时机取得的过多地区，必须把它安置在它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在法国，共产党人在国家的地位只不过是与其他政党有着同样名义与同样条件的地位而已。在选举问题上，任何预测都是危险的赌注。但是，戴高乐甘愿冒着风险，预测共产党在将来的议会选举中是不会得到多数的。

宋子文听了感到很满意，并表示中国希望同它的直接邻邦俄国实现睦邻政策；但国民党政府坚决要使中国共产党保留在他原来的地位上。

戴高乐谈到他在莫斯科的访问，还谈到从那时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他特别提到针对德国所缔结的法苏条约，虽然德国现在已暂时被打垮，但是这个条约作为反对日耳曼主义卷土重来的一个预防或镇压工具仍完全有效。一方面，在东欧受到压制的那一部分土地上，已经成立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俄国的国家集团。另一方面，美国在政治、经济甚至在军事上都保有第一流的力量。最后，中国也已构成一支具有巨大蕴藏资源的力量。法国方面很愿看到在西欧成立一个联合体，这个组织在任何方面都绝不是侵略性的“集团”，而是要

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实现更大的团结合作，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团结合作，非洲的大部领土当然参加到这个联合组织里来。戴高乐表示，他很乐意知道国民党政府是否重视这种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这里面是否能找到经济方面的某些方便条件。

宋子文回答说，中国政府还不能过多地注意欧洲的困难问题。中国政府所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对于与法国政府重新建立过去曾经十分受信任的经济关系，感到特别高兴。法国政府在日本入侵以后，同中国合作修建广西铁路一事，说明法国政府对于经济合作的思想是非常坚定的。

戴高乐即问宋子文，在这方面是否要提出比较明确的建议。并说在他本人看来，这并不是私人集团之间（例如银行集团之间）的合同，而是两国政府间经济合作的全面协定。在这种协定的范围内，上面所提的那些私人性质的合同是很容易办到的。

宋子文回答说，戴高乐的设想同他的设想完全一致，并相信可以毫无困难地把实际可行的措施拟订出来。只要法国驻重庆大使或者是法国政府指定的任何有资格的其他人士尽早前来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就行了。

宋子文还说，他希望知道法国参谋部是否了解德国军队最近在无座力野战炮方面获得的新技术成就，并希望知道法国工业是否已经能够利用这种技术成就。如果法国已经掌握了这种武器，他希望法国司令部能够向中国军队介绍他们的经验。中国军队急需机动性很强的炮兵。

戴高乐答复说，法国司令部将在这方面给中国军队以一切援助。但是，他不认为宋子文所说的新技术实际上已经使用。总之，法国的军火工业还没有作到这一点。

据说这次会谈是在非常亲切地就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以后结束的。④

蒋宋配合 异曲同工

上述1944年12月和1945年2月宋子文与戴高乐的通信,以及1945年9月宋子文与戴高乐的会谈充分表明,宋子文紧跟蒋介石,亦步亦趋,一唱一和,配合搭挡,恰到好处。特别是宋子文同戴高乐的会谈内容极为广泛,远远超出越南问题的范围。在会谈中,宋子文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希望法国仍然是中国在亚洲的邻邦。”这与蒋介石请法国驻重庆大使贝志高向戴高乐转达他乐于帮助法国恢复印度支那的统治权,可算是异曲同工,配合得紧密极了。他们完全忘记了一百多年来法国殖民者侵略我国、统治越南的罪恶历史,也完全忘记了蒋介石同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谈话的谅解。为了运兵东北,发动内战,不惜献媚法国,乞求援助,讨教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其用心何其毒也!但是,宋子文从戴高乐那里讨来的圈套,并未套住中国共产党,而这伙历史罪人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河内一方面军司令部和顾问团,自卢汉起,包括我在内,对以上一切都蒙在鼓里,盲然不知!

④ 威廉·乔治·皮科 (George Picot), 1898年生, 1924年起入法国外交界, 曾任驻苏、中、墨等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驻突尼斯总督公署秘书长、驻美大使馆参赞等职。1942年加入“自由法国”, 任法国驻美代表处民政组组长, 1944年访问中国, 1946年起任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继任驻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大

使。1952年起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年退休，转入工商界。我国解放后，他曾一再来我国访问并于1964年在北京举办法国技术展览会。（参阅1973—1974年《法国人物志》第754页。）

② 见戴高乐著《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下，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397页。

③ 同上，第411页。

④ 同上，第561—563页。